

中国 经济 2040

全球变局与 中国道路

梁国勇
著

CHINESE
ECONOMY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 2040: 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梁国勇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300-23364-2

I. ①中… II. ①梁…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IV. ①F12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7963 号

中国经济 2040

全球变局与中国道路

梁国勇 著

Zhongguo Jingji 2040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规 格 170 mm×230 mm 16 开本

印 张 29.75 插页 2

字 数 426 000

邮政编码 100080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7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CONTENTS<<<<<<<

引言 从 2010 到 2040：中国经济走向巅峰之路 / 1

第 1 章 中国发展：大历史观 / 24

第 2 章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30 年之变 / 49

1. 经济全球化简史 / 49
2. 全球化时代的全球失衡 / 60
3. 强势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的崛起 / 67
4. 金融危机重塑了全球化和中国经济 / 83
5. 全球化新动力：从“美式”到“中式” / 94
6. 世界经济治理新结构：中国的“布雷顿森林时刻”？ / 100

第 3 章 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转型与增长 / 110

1. 中国发展的变与应变 / 110
2. “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 / 124
3. 面对经济增长的新环境 / 139
4. 寻求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 148

5. 传统转型的深化 / 159

6. 新转型的突破 / 170

第4章 新货币政策范式下的国际金融 / 181

1. 全球货币政策新范式 / 181

2. 人民币汇率：从单边升值到双向波动 / 194

3. 人民币国际化：从中国货币到“世界货币” / 206

4. 国际收支：“双顺差”时代的终结 / 214

5. 国家金融安全与资本项目开放 / 221

6. 国际金融体系的完善 / 237

第5章 新区域主义崛起中的国际贸易 / 248

1. 世界贸易重新洗牌 / 248

2. 新竞争，新失衡：全球挑战与中国战略 / 260

3. 保护主义：“世界问题”还是“中国现象”？ / 270

4. 新区域主义崛起与全球贸易体制变局 / 285

5. 自贸新思维：构建面向下一个30年的制度架构 / 295

第6章 引进外资：全球化由强变弱之际的新契机 / 308

1. 中国利用外资的冲击和转机 / 308

2. 外资新政：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政策挑战与创新 / 315

3. 反思外资：量与质两方面的再认识 / 327

4. 提高外资贡献度：本土化和竞争的关键作用 / 341

- 5. 产业版图：“国进民退”还是“内进外退”？ / 350

第7章 海外投资：推动全球化由弱转强的新动力 / 356

- 1. 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中国海外投资 / 357
- 2. “一带一路”：中国发展模式和路径的国际拓展 / 367
- 3. 海外投资、产业升级和全球“新雁阵” / 375
- 4. 成功的企业国际化战略 / 387
- 5. 海外投资政治学 / 398

第8章 货币霸权的削弱与外汇资产管理 / 409

- 1. “美元霸权”与中国巨额外汇财富的形成与挑战 / 410
- 2. 外汇储备还是主权财富：外汇资产管理的变革 / 423
- 3. 外汇资产助力企业“走向全球” / 433

第9章 展望“中国世纪” / 439

图目

- [图 0.1] 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1980—2040（6 页）
- [图 1.1] 世界经济比重分布的历史演变：1—2010（37 页）
- [图 2.1] 全球化在实体经济和金融两方面的量度和比较：1980—2014（61 页）
- [图 2.2] 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1980—1997 和 1998—2015（74 页）
- [图 2.3] 以当期美元计算的主要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2002—2015（87 页）
- [图 3.1] 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2000—2015（140 页）
- [图 3.2] 中国的经济转型：四个“传统转型”和四个“新转型”（160 页）
- [图 4.1] 美联储资产规模及构成：2007—2015（184 页）
- [图 4.2] 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名义实际有效汇率：2005 年 1 月—2016 年 3 月（197 页）
- [图 4.3] 跨境人民币结算金额及比重：2009—2015（209 页）
- [图 4.4] 中国国际收支格局：2000—2015（215 页）
- [图 4.5] 外汇占款月度变化及占央行总资产比重：2008 年 1 月—2016 年 3 月（228 页）
- [图 5.1] 世界商品贸易总量与主要出口国占比：1990—2015（250 页）
- [图 5.2] 中国和美国的统计数据分别显示的中美商品贸易情况：2000—2015（255 页）
- [图 5.3] 中国商品出口总量及主要结构特征：2000—2015（262 页）
- [图 5.4] 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2000—2015（270 页）
- [图 5.5] 针对中国的主要贸易救济措施数量及其占全球总数的比重：2000—2014（273 页）
- [图 5.6] 世界主要自由贸易协定：长期愿景和战略构想（300 页）
- [图 6.1] 全球国际直接投资流出量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情况：2007—2014（310 页）
- [图 6.2] 和中国的外资流入量比较：2000—2015（329 页）
- [图 6.3] 外商投资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总额及其占全国比重：2000—2014（352 页）
- [图 7.1] 中国对外国际直接投资及其区域分布：2003—2014（358 页）
- [图 8.1] 包括外汇储备和中投公司境外资产在内的中国外汇资产总额：2000—2015（413 页）
- [图 8.2] 美国主权债务和美元相对价值：1973—2015（417 页）
- [图 8.3] 中国持有的各类美国证券：2002—2015（420 页）

引言

从 2010 到 2040： 中国经济走向巅峰之路

如果将发展比作登山，那么可以说，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前进，中国经济已行至半途。无限风光在险峰——处在“半山腰”的中国经济能否顺利地继续前行，不断挑战新的高度达到“最高峰”呢？当然，发展之路没有终点，“巅峰”之喻有不妥之处。姑且允许我用它来描述中国经济可能达到的这样一种状态：其一，从收入水平看，中国经济从目前的发展中经济体演进到一个类似现在发达经济体的程度；其二，从经济体系看，中国经济从“摸着石头过河”的不稳定、不确定结构演变到一个相对稳定、完善的系统，并在产出和分配方面实现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效率和公平并重”的转变；其三，从经济增长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大幅波动的高度动态转变到稳定增长、小幅波动的相对稳态，同时经济增长呈现更强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并更好地满足普通民众对于幸福生活的追求。请注意，这里我并未提及总量指标和以总量为依据的排名。换言之，我所说的“巅峰”状态并非指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而是超越了这一标准。

30 年之变：中国经济向何处去？

“30”似乎是中国历史中一个神奇的数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俗

语在中国近代史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以 30 年为界限，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现代史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各有其主题：建国前 30 年（1919—1949）的自救；建国后前 30 年（1949—1979）的自立；改革开放 30 年的自新（1979—2009）。在每一个 30 年的关键转折点，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转变，中国经济则经历了从自主到起飞再到赶超的提升。在改革开放的 30 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从计划向市场、从封闭向开放的彻底转型，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在这个 30 年大棋局收官之际，一场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重创世界经济，支撑中国高速增长的全球化也面临重大变局。中国经济逆势前行，规模跃居世界第二，并开始向世界最大经济体迈进；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升级，中国也开始引领全球化由弱转强的进程。与此同时，在民族复兴的关键时间节点，国家领导核心也经历了 30 年来的重大变化，治国理政气象一新。

下一个 30 年，中国经济在一代人左右的时间内将走向何方，2040 年代的中国将会怎样？建国百年之际、2049 年的中国将会怎样？从 2016 年开始实施的第十三个五年计划如果顺利完成，意味着 5 年后“全面小康”目标的实现。那么，10 年、20 年后，中国经济是“欧美化”还是“拉美化”？回答中国经济向何处去的问题，必须对以下几方面有客观、清醒的认识：第一，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如何，在纵向和横向的比较中位置是怎样的——或者说，我们现在在哪里；第二，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取得的成就是怎样的，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就——换言之，我们以前做对了什么；第三，中国经济现有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内部情况和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何——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再做什么。三者的政策意义是明显的：第一个问题涉及经济目前水平和目标水平的关系问题，关乎长期增长目标的设定和增长路径的构想；而对后两个问题的思考则告诉我们，经济体制、发展模式等方面哪些经验应当坚持，哪些方面需要变革。对前两个问题的认识是我们“自信”的来源，而对后一个问题的认识是我们“自新”的动力，两者并不矛盾。实际上，面对经验和成就建立“自信”并不难，而面对积弊和变局不断“自新”才是真正的挑战。

以当期价格和汇率计算，2015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达到 11 万亿美元，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人均 GDP 约 8 000 美元，排在近 80 名的水平。中国的人均 GDP 从 800 美元到 8 000 美元仅用了 17 年的时间，增长速度之快没有先例。然而，汇率、通胀率带来的实际购买力影响不可忽视。另外，考虑到中国经济收入分配严重不平衡、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实际上相当数量的国人仍然维持在以国际标准衡量相对较低的生活水准。从历史上看，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中古时代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18 世纪以来，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推动了欧洲的全面、高速崛起，而中国则开始了相对和绝对意义上的双重衰落。从“大历史”的视角看，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腾飞仍处在“追赶”西方的阶段，距离达到西方的人均生活水平，乃至“超越”西方回归历史上的领先地位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局部的超越并非没有可能而是正在发生，但从“跟跑”到“领跑”的全面转变仍需要几代人的时间。

战后各国发展绩效的国际比较表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发展速度之快、影响之深远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空前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是一部经济转轨（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几方面紧密交织、协同演进、共同推动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中国奇迹”背后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因素很多，其出现取决于不同层面、内部外部众多因素的叠加，从宏观上涉及上述多重转型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合力。与具有相对可比性的印度的比较可以说明一些问题：30 年前基本处于相同起跑线上的两个发展中大国现在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几乎所有指标上都已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无论是与自身历史还是与他国比较，这 30 年的高速发展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中国发展模式的有效性不言而喻。

然而，决定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部分重要因素正在发生变化。回到“登山”之喻：经过前期的高速攀爬，处在“半山腰”的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天气变了——从原来的艳阳高照到疾风骤雨，再到持续阴霾。始于 2008 年美国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包含金融、经济和债务三重危机，其对

世界经济的冲击仅次于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Great Depression)。这场危机的“震中”出现在发达国家,其对世界经济冲击的烈度也是大危机之后所仅见的。更为重要的是,金融危机分别经历了美国、欧洲、新兴市场交替重叠的“三波”,并开始展现其对全球和中国经济的“二次冲击”。由于持续的有效需求不足,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低速增长时代。与此同时,冷战结束以来的全球化浪潮由强转弱,与中国经济的“30年之变”同时发生的还有全球化的“30年之变”。对积极谋求开放发展的中国而言,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制约着经济沿着原有路径高速前行,而保护主义抬头和全球化逆流则甚堪忧虑。

其次,以前的路越来越不好走了——从原来的缓坡坦途到现在的陡坡泥泞。中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有利条件(如“人口红利”、低成本要素的大量供给等)逐渐消失,前期积累的矛盾(如环境、社会问题)日益尖锐。另外,原有的以出口和投资驱动的发展模式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高耗能、高污染的粗放式发展道路越走越窄。与此同时,石头不好摸了,障碍不好绕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过程中,采取了一条边干边学、“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主义路线,对一些障碍采取了“绕着走”的回避态度。现在,改革步入“深水区”,某些领域石头不好摸了;一些原先可以暂时回避的问题也到了不能再回避、只能去解决的时刻。

尽管面临困难和阻力,中国经济最终在总量上超越美国并无多大悬念。然而,如前所述,我所说的“巅峰”状态实际上远远超越了总量目标,更多地强调经济系统、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从对GDP数字和经济总量的追求到对经济发展的包容性和可持续性、对人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的强调,从落后的紧迫感到比肩后的从容不迫,从“现代化”的大干快上到“后现代化”的细腻恬淡——“巅峰”之喻还蕴含着一些心理和认知层面的内容。

“赶超”蕴含追赶和超越两个阶段,总量和人均两个层次。其实,追求总量第一的目标有意义,亦蕴含危险。曾几何时,受狂热的政治热情驱使,不切实际的总量指标成为政策制定的依据,蔑视科学和人性的政策实践给国家带来了深重

的灾难，“以钢为纲”、“超英赶美”的政治口号也成为一代人的痛苦记忆。从对科学的尊重和对人性的解放开始，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经济才真正步入了发展的正轨。不经意间，中国的钢产量占到了超过全球半数，经济总量“超英”早已成为现实，“赶美”也不再是梦——实际上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的 GDP 已经于 2014 年“提前”成为世界第一。当然，购买力平价对经济规模的高估是明显的；但即使以实际汇率算，中国也已成为美国之后第二个拥有 10 万亿美元以上 GDP 的国家。问题是，中国经济将如何前行，下一个 30 年向何处去？

2009 年 12 月我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目标应适当下调》的评论文章，提出中国经济 2010—2020 年的增长目标水平应下调至 7%。^①呼吁降低经济增速目标，我可能是最早的。之后我高兴地看到，此建议已成为现实：“十二五”规划（2011—2015）的年均经济增长率预期目标被确定为 7%。特别是近两年，适当降速增长成为决策者的共识，也成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内涵。我在 2009 年的这篇文章中阐述了下调经济目标增速的必要性，并特别强调了“保增长”与“调结构”及“防泡沫”的矛盾。虽然中国经济面临的情况和问题有了明显改变，但拙作的基本逻辑仍然适用：决策者应客观认识经济内外部环境的限制，制定合理可行的增速目标，避免对经济的强刺激。另外，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变量应多元化，并注意关注“短期风险变量”和“长期结构变量”。实际上，2009 年此文的写作也与我当时经济刺激措施规模过大，导致债务、产能、坏账过度膨胀的短期担心有关，体现了我对外部环境骤变情况下中国经济下一个 30 年长期发展的思考。2009 年 9 月，我在题为《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发展模式重构考验》的评论中写道：危机后的“此常态”已非危机前的“彼常态”，面对“新常态”，中国对外必须捍卫适度的政策空间，对内则须主动地、适时地进行发展模式的调整和重构。只有重塑“中国模式”，才能再创“中国奇迹”。^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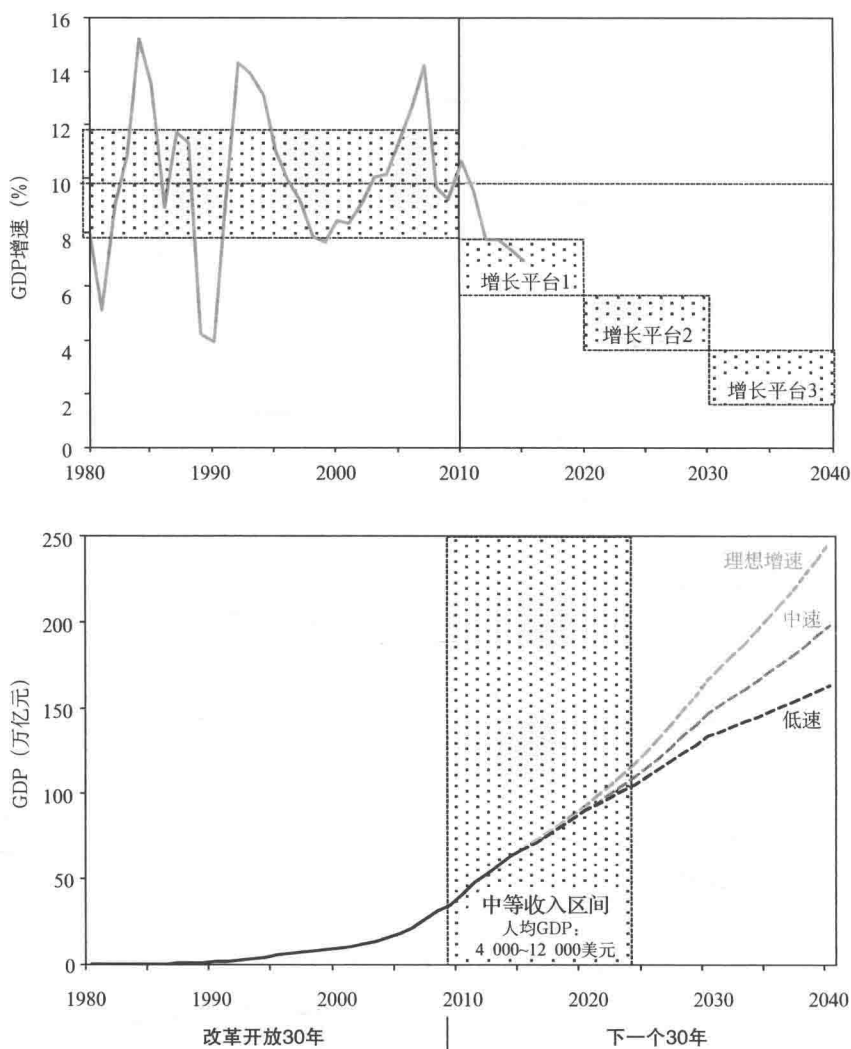
① 参见《经济参考报》，2009-12-08。

② 参见《经济参考报》，2009-09-28。

展望 2040 年，中国经济有望经历 6%~8%（中高速）、4%~6%（中速）和 2%~4%（中低速）这三个持续十年的“增长平台”（见图 0.1），呈现长周期的

中国经济的增长路径：1980—2040

图 0.1



资料来源：1980—2015 年来自国家统计局；2016—2040 年为作者估算。

“L”形走势。经济增速随收入提高在长期内递减的规律在理论上可以从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不同角度进行解释，在实证方面也可以通过发达经济体和赶超型经济体（如亚洲四小龙）的历史数据加以验证。当然，历史经验同样表明：保持长期增长并非必然；在重大危机冲击或结构弊病困扰下，经济负增长和长期停滞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因此，“增长平台”假设的一个重要前提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优化结构并避免重大危机的冲击。在此前提下，国内、国际经济的不确定性及其对经济增速的影响基本反映在“理想增速”、“中速”和“低速”三个场景假设之中。

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了其经济已经迈入了“上中等收入经济”（upper middle income economy）的门槛，下一阶段的挑战是如何在 6 000~12 000 美元的中等收入区间继续前行，并成功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向高收入经济体挺进。从中美经济的比较看，假设汇率保持不变，美国经济持续以 2% 的速度增长，而中国经济沿“理想增速”场景运行，中国 GDP 总量将于 2030 年左右超过美国，人均 GDP 将达到 18 000 美元。在同样假设的基础上，2040 年的中国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约 30%，人均 GDP 将达到 27 000 美元，约为美国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在“中速”场景下，中国经济整体规模超过美国的时间将推后 5 年左右。逐渐降速增长的“路线图”看似保守，但却是中国经济“走向巅峰”的坦途：以 2009 年的水平为基础，只要中国经济沿着以上路径顺利前行并避免大起大落，到 2020 年代就可以步入“高收入”门槛，到 2040 年代就有望达到前述“巅峰”状态。

根据长期发展目标、中期阶段变化和短期潜在增速确定一个适当的目标增速水平，将是中国经济决策者始终面对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对短期“潜在增长率”的确定是经济目标增速管理中的一个战术问题，那么对经济增长长周期、“大趋势”的预测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无疑，沿着次第下调的“增长平台”运行是中国经济演进的一个比较理想的场景，可以成为发展战略制定和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长期指引，以及引导和稳定社会预期的一个重要工具。

对未来走向的长期预测为各类经济主体的很多决策所需。面对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沿着中速以上的理想轨迹演进的可能性较大。中国经济发展仍具备巨大的“后发优势”，新的增长动力也将通过各种途径持续释放。从国际比较看，相对于其他具备类似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在综合国力、市场规模、人力资源、科技水平、创新潜力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是无可比拟的。另外，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消费潜力、投资能力、城市化水平仍然意味着很大的增长空间，而公共债务、财政赤字和居民部门杠杆率仍可为增长潜力的释放提供支撑。然而，能否沿着一条类似亚洲四小龙的发展轨迹较快达到高收入水平，中国则面临明显的限制：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来自国际市场的增长动力明显减弱；而随着国家的崛起，来自地缘政治的阻力逐渐加强。另外，老龄化和人口结构的演变必然意味着增长动能的持续下降。同时，各方面风险的持续累积则可能导致危机爆发，并使经济列车“脱轨”。无论如何，能否避免重大经济、金融、社会危机的爆发是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发展路径的关键。

潜在需求水平限制了经济的短期增长速度；而经济整体的债务水平和杠杆率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的长期增长空间。忽视这两方面限制的盲目扩张可以实现短期的高增长，但其带来的风险累积最终可能以金融危机爆发、经济硬着陆的形式释放。决策者对当前和未来、内部和外部、经济和其他领域的挑战不可低估，对 GDP 增速的期待值不宜过高。实际上，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经济增长从高速向中速的转变。在高速发展 30 年之后，特别是在超高速、“透支”增长 10 年之后，中国经济应更好地平衡“快”与“稳”的关系，政策的基调应该从“求快”转为“求稳”。何况，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有利因素减少，不利因素增多。因此，经济的掌舵人理应主动换挡，适度减速，以降低行驶风险。从长期来看，阶段性降速、区间内稳定不失为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政策选择。

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的赶超之路往往并不平坦，由中、低收入到高收入国家的“升级”实际上非常困难。很多低收入国家一直陷于“最不发达泥潭”

之中，经济难以起飞，国家长期贫穷。即使跨过中等收入门槛，能够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也很少。如同孩子长大后长得也慢了，一个经济体在规模和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实现高速增长的难度也必然加大，这方面的限制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从国内看，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提升要求经济结构的转型、产业体系的升级、金融深化的推进和收入分配的完善——对很多国家而言，这些转变的困难和不确定性很大。从国际看，随着一国收入水平的提升，其面临的国际竞争也相应地“升级”。实际上，国际经济领域的分工和竞争也是“中等收入陷阱”存在的重要原因。积极发展外向型经济可以为一国经济的“脱贫”提供强大的动力，但“致富”则没有那么容易。外资方面，随着一国收入的提高，生产成本的上涨往往导致外资转出。贸易方面，如果竞争力不能有效提升，一国可能长期困于低端产品的出口，难以实现向高端产品的升级。金融领域，随着金融深化和开放的推进，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可能使经济元气大伤。中等收入国家除了面临来自较低和类似收入国家的压力外，还面临来自高收入国家的阻力，而后者正是很多国家在中等收入水平上长期止步不前的主要原因。当然，“陷阱”对高收入国家也可能存在，日本即是典型的例子：其名义 GDP 自 1990 年代中期至今一直停滞不前，处在 500 万亿日元左右的水平上。

超越“陷阱”、走向“巅峰”要求中国经济成功地进行转型和升级。展望未来 30 年的中国经济，创新和经济的多重转型将持续释放增长动力——始于改革开放之初的市场化、国际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传统转型”将继续深化，而消费增长、服务业发展、经济绿色化和数字化（智能化）等方面的“新转型”将发挥更关键的作用。第一，消费转型是经济基本增长动力乃至价值导向的转型；换言之，经济增长应更多地以国内消费为动力，并服务于国民经济福利的提升。显然，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是消费转型的基础。第二，服务转型是伴随中国经济提升所必然经历的一个产业结构的变化；从更广泛的视野看，服务转型是中国经济和社会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必然转变，其意义不亚于

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的转变。第三，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是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在经济各领域的深入、创新运用，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信息和实物、人和机器关系在后工业化时代的重构。第四，绿色转型是中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从高消耗、高污染、高环境社会代价到低消耗、低污染、环境社会友好的转变。当务之急是环境污染的治理、环境健康问题的应对，而从长期来看则意味着经济与自然、社会关系从对立、失衡到和谐、平衡的根本转变。各方面的转型相互关联，既包括原经济模式的调整，也涉及新经济模式的引入，其中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样重要。伴随结构转型过程的是经济增长新旧动力的转换。显然，有效的创新和持续的转型必须以市场和竞争力为支撑才能服务于经济增长和长远发展。

中国经济的转型意味着城市和乡村、消费和投资、服务业和制造业、经济和环境社会等各方面关系的调整，也意味着增长新动力的不断释放。面对阻力和阵痛，必须以前瞻性、战略性的眼光提前规划“转大弯”，避免遇到问题“急转弯”。消费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增强是解决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核心问题，这两方面的持续进展也将带动一个规模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从“世界工厂”到“世界市场”的转变不仅是中国的机遇，也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消费者”将成为“中国工人”之后世界经济中的一个决定性力量。显然，中国经济“新转型”将是全局性、历史性的，其影响也具有世界意义，是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

国际比较充分说明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有效性。然而，对该模式存在的问题也必须反思，特别是在发展的环境和社会代价方面。另外，应该强调的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不应是固化、模式化的，而应是不断演进、优化的。中国发展的成功在于务实、学习、应变，一条重要经验在于一个“实”字：实用主义、实践导向、实干精神。如果说“中国模式”是对过去发展经验的总结，那么“中国道路”则是对未来发展战略的探索。中国发展战略的确定和发展道路的选择应当吸收各国的成功经验，做到“广征博引”，并根据内外部情况的变化积极主动调整，做到“以变应变”。同时，也应主动谋变，“以变促变”——这就要求中国增强在